

中华文化
人学
书系

● 张莉红
● 罗波 著

天
理
人
欲

四川教育出版社

中华文化 **人学** 书系

天 理

张莉红
罗波 著

人 欲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理人欲: 张莉红, 罗波著.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2001

(中华文化人学书系)

ISBN7-5408-3606-3

I. 天... II. ①张... ②罗... III. 理学-研究
IV. B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846 号

责任编辑: 武 明

技术编辑: 王 凌

封面制作: 何一兵

责任印制: 吴晓光

中华文化人学书系

天理人欲

张莉红 罗 波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成都市盐道街 3 号 邮政编码: 610012)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地址: 成都市人民北路一段 16 号 邮政编码: 610081)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880 × 1230 1/32 印张 13.625 字数 301 千

印数: 1-3,000 册

ISBN7-5408-3606-7/K·59 定价: 26.60 元

* * *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电话: (028) 3193012-3093

总

序

“人学”就是关于人的学问，而中国传统人学则是中国历史上的历代思想家对人自身及其思想、行为的自我认识，它是涉及人的本性、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生价值、理想人格等诸方面的问题。

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哲学以人为核心、以天人观为框架、以道德说教为主要内容、以社会政治为最后归宿的特征相当明显，从而形成了与西方哲学相区别的民族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人学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问题。

春秋战国之际，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学术空前繁荣的诸子竞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期间所产生的种种学术思想，大致确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而几乎与此同时，古印度、古西亚、古希腊也发生了类似

的情况。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人类历史上的这一时期为“轴心时代”，依据他的说法，这是人类精神大觉醒的时期。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人学就是在这一时期奠基了。

在远古文化的背景上，经过宫廷王官和民间知识分子的理性制作（这实际上是一种不断地“创造性误读”过程），“五经”在春秋时期基本形成定本，并走向民间。

“五经”的基本精神是一种“实践理性”，先民们开始对外在世界进行系统的、辩证的思考，并以典籍的形式将民族的基本精神加以定型。这几部文化元典以其首创性、广阔性、深邃性成为中华民族垂范永久的指针和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规定了春秋战国人学乃至后代人学的基本走向。

由孔子开创的先秦儒家人学，是中国传统人学的主流。

儒家人学的产生，以中原的自然环境为背景，以夏商周三代文化为温床。儒家的人学思想具有浓郁的伦理特征，缺乏思辨色彩，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儒家以“仁”、“礼”等观念为中心，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人的品质、人格、道德、修养等问题，并对人作了初步的界定。在儒家的人学思想中，最为突出的特点是对社会性的强调，而且人的这种社会性与伦理道德紧密相关，隐藏在这一表面特征背后的是坚定的价值信念。儒家坚信，亲亲（仁）和尊尊（礼）不仅是历史事实，也是人类的必然归宿。而先秦儒家大师孟子的性善论，则把理想人格根植于个体的内心世界，把道德的理想与道德的实践安置在同一层面，因此，孟子的人学思想具有极大的感染力量，从而对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与儒家立足于现实社会去建立人学理论相反，道家玄想万物，思辨宇宙，洞察人生，他们反对已经异化了的仁义道德，从天道无为演绎出人道无为，否定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区别，因而贯穿了一条自然主义的路线。道家在对世俗的价值观念作了整体否定之后，回归于道并且把握住这惟一的绝对。他们以为，至德之世不需要圣人，不需要政治，不需要人为的规范秩序，也不需要任何文明的成果，但却最完整地保持了人的自然本性。道家的人学理论虽然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它导致的是个人的解脱而不是社会的改造，但这种学说主张把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限的宇宙中去，从而获得永恒的自由。道家这种对于个体生命意义的自觉探索，拓宽了价值关怀的领域，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以孔孟为代表的社会学派人学理论以及以老庄为代表的自然学派人学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人学的历史主线，它们相互驳难，相互弥补，构成了中国传统人文的基本风貌。

秦帝国的建立，使法家压倒了诸子，但法家对人类共同命运的漠视以及对个体人格的鄙夷，决定了它根本无力承担其凝聚人心、稳定社会的重任。秦王朝的短命就是证明。

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经过董仲舒重新阐释过的儒学成为官方思想。董仲舒人学理论的建构，就是把儒家的人生理想与现实的王权相结合，从而使儒家的价值观念转化为具体的政治操作程式。然而，当儒学被神化发展到相当

程度时，它固有的理想光泽便丧失殆尽，普遍的道德变成了极其虚伪的东西，个体势必重新寻找其生存的意义和价值。东汉末年伤感文学的出现正是这种寻找的前奏，它预示着魏晋时期人学的再次繁荣。

魏晋士人放浪形骸，任意而为，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风度。魏晋风度的背景是玄学。玄学的主题就是魏晋社会的主题，即人生价值在玄风中的回归。人们由此重新确定生命的价值。玄学注意自然与名教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实质就是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关系。玄学家们看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即人不仅仅是社会的人，也是自然的人，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把二者结合起来。然而，玄学的道家性格，最终使他们的担待意识失去了着落，只留下画地为牢的逍遥。这样，佛教就借机发展起来了。

从历史上看，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占有突出的位置，这在南北朝时就发生了。隋唐时期，儒释道互相渗透，互相排斥，人们的思想比较活跃，而佛教的影响几乎无处不在。即使在盛唐时期，我们也能够在豪迈的文字背后体会到一种对神奇的沉思；即使在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里，我们也不时地发现闪闪的“佛光”。

宋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高峰期，清醒的理性主义、历史主义的华夏传统战胜了宗教迷狂。理学家们把天人整体的本质归结为天理，认为天理就是人道与天道的合一，它既是伦理道德的本质，又是宇宙万物的本质。这样，先秦儒家所强调的“仁”，就不仅仅是人之必然，而且也是宇宙的必然。面对释道二教把越来越多的人引向消极的个人

解脱，理学家自觉地把个体生命的意义纳入到人类整体命运视野中考察，表现出远远高于释道二教的关怀精神。

明朝中期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耗尽了它的内部生命力，中国社会正孕育着巨大的变化，表现在思想领域，则出现了反抗思潮和极端情绪，这在李贽的思想里得到了充分的反映。明清之际的政权更迭，使得人们加深了对封建文化的怀疑。王夫之猛烈抨击专制独裁制度，反对压抑情欲，痛斥蒙昧主义，横扫奴化思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启蒙倾向。而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更是石破天惊之作，作者为中国近代勾画了一幅民主主义的理想蓝图，他用“风雷之文”召唤“豪杰之士”起来冲破束缚，为争取真正的人的权利而斗争。

鸦片战争之后，窘迫的社会现实促使一些人把目光转向西方，而另一些人则更加迷恋传统。这种激烈的冲突，预示着中国人学正孕育着一场划时代的转变，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则是这种转变的标志。鲜明地把“立人”（即改造旧人、塑造新人）置于文化革命的首位，这是鲁迅超过同时代人的远见卓识，也使他成为一面伟大的旗帜。在随后一系列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古老的中华民族得以再生，而中华民族的心灵旅程也发生了一些巨大的变化。

以上就是中国传统人学理论的基本脉络。

目前，中华民族已经迈进21世纪。21世纪是一个知识经济的世纪，它也应该是一个真正的以人为本的世纪。因此，关注一下中国传统人学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那些终日为“物质”而奔波的人，更应该注意自己的“心”是否丢失了。中国传统人学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不可能

不对今日之现实产生某种影响。从传统到现代的发展是不可避免和不可逆转的。但是，传统继续存在于现代化之中。实际上，现代化过程自身一直受到扎根于古老传统的多样文化形态的制约。我们以为，了解中国传统人学中的精华，对于今日之国人是有意义的，对于实施“以德治国”是有意义的。比如说，儒家坚持平等比自由重要，同情比理性重要，礼教比法治重要，责任比权利重要，人际关怀比个人主义重要，这似乎与启蒙运动的价值取向相对立。因此，许多弘扬儒家学说的行为常常在西方引起冷嘲热讽。但是，现实告诉我们：从家庭到国家，所有层次上的社会危机正在证明社会正义、心灵沟通、相互理解、承担责任和休戚与共的意识，对于人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所谓的儒家价值，正如启蒙价值一样，也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在今日之中国，中国传统人学起码在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充分重视：

1. 追求尽善尽美的理想境界。在中国历史上的多元人学理论中，不同程度地体现着一种精神动力源泉，那就是对尽善尽美理想境界的追求，也可以说是对真善美和谐统一的追求。尽管各种学派对真善美的理解不同，但将真善美视为最高的人生理想则并无不同。同时，中国传统人学的各个学派都将真善美视为天道的体现，这样，人类在对真善美的追求中就实现了与天道的融合，即所谓的“天人合一”。

2. 具有一种历史主动精神，勇于承担天下之太任。作为中国传统人学主流的儒家学派，始终强调以天下为己

任，即所谓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不言而喻的；墨家学派的四处奔波，也不过是为了“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法家学派虽然具有一种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味道，但他们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以及为此勇于献身的精神，也具有一种感人的悲剧意味；至于道家学派，在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激烈抨击中，我们也不难体味到对人类历史以及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

3. 保持个体人格尊严，注重品德修养。中国传统人学虽然不如西方文化那样强调尊重个体人格，但并不是不尊重个体人格。对中国传统人学影响深远的“庄子精神”，不过是个体尊严、心灵自由等一系列相关概念的合成；即使是十分强调人之义务的儒家学派，其对于个体人格尊严的论述也不胜枚举。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传统人学始终将个体人格的尊严与品德修养结合起来，而且强调这种品德修养应该与为学相一致，与为政相一致。这样，个体的人格尊严与品德修养就具有了更为广泛的社会文化意义。

4. 控制物欲，安贫乐道。对放纵物欲的抨击，始终是中国传统人学的主旋律之一。但是，一般地说，中国传统人学并不是极端地主张消灭物欲，而是强调要将其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同时，中国传统人学对物欲横流的抨击，往往与对统治者的抨击结合在一起，老庄学派就是这方面的证明。而儒家学派的“贫而乐，富而好礼”（《论语·学而》），更是向人类指出了较为理想的人生走向。总之，中国传统人学的“安贫乐道”不是强调以贫为荣，而是强调在财富与精神不可兼得时理应选择后者，这显然

是一种较为深沉的人文主义精神。

可以说，中国传统人学中以上几方面内容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而且将永远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此，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希望对读者有所帮助。

本书由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李殿元、张绍诚先生审定。

引

言

历史演进到宋代，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冲突达到了积重难返的境地，这是残唐藩镇割据，五代政权更迭留下的历史恶果。赵匡胤于建隆元年（960年）开创的赵宋时代，尽管靖康二年（1127年）以后，在北方金国的侵削下，只勉强维持着江南半壁山河，到祥兴二年（1279年）最终被蒙古铁骑灭亡，差不多也拥有340年的历史。在史家眼里，这是一个颇有争议、又值得关注的时代。一方面，宋代社会弊端丛生，矛盾百出。它拥有繁荣兴旺的社会经济，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对外贸易都达到历史最好时期；但人口增长太快，土地过分集中，赋税、徭役负担又不公平，导致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动荡，农民起义不断。严重的贫富对立和社会负担不公，激烈的土地兼并和高利盘剥，造成

“贫富无定势，贵贱无永时”，“富贵盛衰，更迭无常”的动荡不安的局面。两宋三百多年中，由平日“力耕之民”铤而走险，“荷戈持戟，群起而为盗”者，可以说是如过江之鲫，难以数计。

苏轼留心下层情况，他描述“盗贼”蜂起的原委说：“挈妻负子以分升合，虽有丰年，而无余蓄，一遇水旱则弱者散于天下，而强者聚为盗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一七“均户口”）

赵匡胤借助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计谋，重演五代通官戏后，深感人欲横流，难以自保。若要坐稳这江山，保住家天下，非除掉一切潜在的敌人不可。所以，无论是“杯酒释兵权”，还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的故事，都是赵匡胤为巩固一统江山，将一切可能有不臣之心的势力斩草除根的“南面之术”。

赵宋政权建立了庞大的中央集权官僚机构和财赋收支系统，但是效率不高，问题很多。据估计，即使在吏治情况较好的北宋前期，真正奉公守法、关心民瘼的官员也不超过百分之二十（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九〇）。“州县之地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宋祁《景文集》卷二六《上三见三费疏》）南宋理宗宝祐四年（1256年），有人揭露冗官积弊说：真宗、仁宗时，以320余郡的钱粮供给10000多官吏的俸禄；现在是以100余郡的钱粮来养活24000多冗官，其结果却是“境土蹙而财敛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见蔡美彪等《中国通史》第五册第428页）。官越多效率越差，已是不争的事实。

赵宋政权拥有统一调遣、编制严密、数量庞大的军

队，兵员从宋初的 20 万人增加到仁宗时的 126 万人。南宋时养兵数量更多，朝廷养兵的费用达到财政开支的十分之七八（同上书第 118 页）。但是无论是对辽或西夏的侵扰，还是对金或蒙古的进攻，它几乎是十有九败，很少获胜。令人奇怪的是，无论胜败，其结果不是纳币求和，就是偏安称臣，甘作儿皇帝；甚至一有动静，就逃到海上避难。

它的问题常常被归纳为“积弱积贫”，实际上是腐败的官僚政治造成的，因此，它被某些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史的学者称为“最没有建树的一环”。

另一方面，与政治、军事的衰疲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宋代思想、文化领域呈现出朝气蓬勃、流光溢彩的创新气象。其中特别是宋代的儒学——理学或称之为道学，积历代儒学大成，吸取佛教、道教精华，熔铸成独具理性特色的思想体系。现代史学大师陈寅恪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这是画龙点睛的确论。

这一现象的出现有其不同寻常的时代背景。

结束残唐五代以来强人争斗、兵连祸结的血腥岁月后，宋人普遍有重见天日的欢悦心情。不少山野之民取名“同文”（《宋史·隐逸传》），“鼓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王禹偁《畚田词》）。宋初这类讴歌太平盛世，陶醉田园生活的诗文，正反映了人们在结束朝不虑夕、人命危浅的长期灾难生活之后，重新追求人生价值，建立生活信念的愿望。

“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是赵宋统治者吸取了残唐五代以来藩镇割据、军人专权的沉痛教训，从根本上解决战乱纷争问题的措施。功臣、宿将淡出权力机构，皇帝收回政权、军权、财权、用人权以后，必然需要大批没有权力背景，但有治国才能的文人学士担负起从中央到地方各个职能部门的管理工作。各种识拔人才的方式比较之下，相对公平的科举考试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于是，大批读书人开始源源不断地进入士大夫阶层。

“重文轻武”成为赵宋国策以后，广大出身寒微的士人就有了进身之阶，他们通过科举考试入仕，为自己寻求显达之路，即所谓“一登龙门，则身价百倍”。通过读书而显达的士子虽然是少数，但只要有实现了这个目标的实例，就具有足够的吸引力了。“读书人”、“书香门第”、“耕读传家”称呼的出现，正是时代风气改变的标志。适应天下人求学、读书的需要，各种官、私学（塾）纷纷开办，代表较高学术、教育水平的书院也在人文荟萃的繁盛之地开办起来。宋代教育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北宋出现三次开办官学的高潮，两宋开办三百余所书院（参见樊克政《中国书院史》第49、92页注1和胡昭曦《四川书院史》第24页），正是宋代统治者重视教育的必然结果。

残唐五代以来，纲纪废弛，道德沦丧，强者为王，败者为寇，兵革不息，生灵涂炭，给宋人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如何重振纲纪，再造文明，不仅是赵宋统治者孜孜以求的头等大事，也是读圣贤之书的士子们的当务之急。赵宋王朝建立以后，内忧外患不断，对辽和西夏一再屈辱

议和，及至靖康二年（1127年）徽钦二帝被掳，让有良知的士子痛心疾首，难以忘怀。南渡以后，仍然承受着北方金人的武力威胁，国势垂危，苟安难继；权臣当道，北伐无期。加之人口过分增殖，赋役负担不公，酿成严重社会危机，三百年间，农民反抗不断。宋人遭逢的这一切，必然深深牵动生活于其间的士子们的理性思维，促使他们去吸取包括佛家、道家经典在内的一切优秀文化，对自己信奉的儒家学说进行加工改造，使之适合当时社会的需要。

这就是以理学为代表的宋代人文精神臻于鼎盛的基本原因。

天道与人世、“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在人欲横流的魍魉世道面前，作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应当怎样施展自己的才智，挽救这衰微的世道人心？从北宋初年开始，有良知有道德的明君贤臣、文人学者便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思想，与社会现实结合，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对自然与社会、君主与万民、天理与人欲、伦理与功利、入世与出世、科学与文明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思索与研究。

宋代理学勃兴，归根结底是为了探索人与社会和自然的关系，寻求天理制约人欲的途径，达到重新规范人伦道德的目的。

理学家以外，宋代文人学者却在寻求自身价值中创造多姿多彩的人文世界。他们将求知热望转向物质世界，探求自然奥妙，得到真知灼见，为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光彩

篇章。

作为宋代思想精华的理学，是宋儒对先秦儒家学说中直面人生、求实存真、勇于进取、自强不息的入世精神，从哲学的角度重新进行了理性认识的发挥后创立的。

理学虽然驰骋于理、气、无极、太极、心、性、命等抽象概念之间，但与佛家、道家的“涅槃”“道谛”“苦灭”“圆寂”“太虚”“三界”等概念绝不相同。它有确切的实际内涵，否定虚幻的彼岸，通过“诚”的途径在现实世界中求得“实学”地位，获得“理”的真谛。

虽然宋代也有永嘉、永康等事功之学的存在，明清之际还有一批启蒙思想家起而批判理学的某些传习者空谈性理的倾向，但据此否定理学积极入世的本体精神，却是十分片面的。事实上，他们的责难并不在哲学范畴，而是在“经世致用”和事功方面。因此，由此否定理学的主导方面也是毫无道理的。

理学继承了中国先秦时代的辩证思维，充实了《周易》“太极”的内涵，对有无、始终、生死、阴阳、动静等对立统一问题作了富有思辨意义的阐释，实际上否定了周秦以来的天命观，以及“君权神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专制信条，恢复和发展了先秦思想家的理性精神。中国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的神权统治，理学起了重要作用。

宋代理学对先秦儒家学说中“仁”“礼”等观念作了适应时代发展的理解，从过去贵贱色彩甚浓的“牧民”“畜万民”等歧视庶民的观念转变为“平物我”“齐上下”等平等、泛爱观念。朱熹明确表示：“仁是爱底道